工业遗产是人类工业文明的纪念碑，是劳动者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本版推出“触摸工业遗产”栏目，走近《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所收录的工业遗产，深入挖掘遗产背后的故事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反映中国工业文明发展图景及工业遗产保护现状，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编　者

走进大庆油田——

60年“黑金”故事，听我跟你说

本报记者　**柯仲甲**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三口基准油井（简称松基三井）喷射出工业油流，标志着大庆油田被发现。如今，以松基三井、萨55井、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旧址（后建成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等为代表的大庆油田工业遗产，诉说着大庆油田60年来开发建设的故事

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　　本报记者 **柯仲甲**摄

上图：王进喜“跑井”检查工作时骑过的摩托车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供图**
下图：1960年1205钻井队使用的贝乌-40型钻机主机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供图

60年前，松辽盆地沉睡百万年的黑色黄金从这里喷涌而出，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在这里拉开序幕……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它位于黑龙江省中西部，60年来累计为国家贡献近24亿吨石油，上缴税费及资金2.9万亿元。在这片土地上，每一处工业遗产都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的见证。走进大庆，触摸那些凝固着历史瞬间的工业遗产，听它们讲述油田开发建设的故事，感受新中国石油工业走过的壮烈征程。

松基三井：那一刻，我见证了历史

我叫松基三井，生于1959年。那时候中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原油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销售量为504.9万吨，其中自产仅205万吨，自给率为40.6%，大量原油和成品油都依靠进口。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是，石油生产和消费布局很不协调，98%的天然原油产量和61.7%的原油加工能力在陕、甘、青、新四省区，而90%以上的消费量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

为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在石油勘探上取得突破，找到新的大油田。一批先驱者们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并预测“松辽有油”，对于中国石油工业掀开新的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就在我出生前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时指出：“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还说：“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由此，中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我所在的松辽盆地成为当时石油勘探的主战场。技术人员们立下“三年攻下松辽”“尽快在东北找到大油田”的豪言壮志，在这片荒原上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勘探工作。

1958年，我的大哥松基一井和二哥松基二井相继开钻。作为松辽盆地石油勘探的第一口和第二口基准油井，技术人员在它们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但石油却没有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喷涌而出。同年9月，技术人员在当时的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地区找到了我，对我寄予厚望。经反复勘测论证，最终确定我的位置。

1959年3月，负责对松基一井施工的32118钻井队克服大型车辆和吊装设备短缺、道路翻浆等重重困难，依靠队里仅有的8台解放牌汽车，硬是把几十吨重的钻井设备从120多公里外拖到了这里。4月11日，钻井队正式开始钻探。

一开钻，场上就不断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井深1112米到1171米井段，取出的油砂呈棕黄色，具有较浓的油味；钻至1461米时，岩心油砂含油饱满，气味浓烈……专家们对我的设计井深原本是3200米，但在钻探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井斜，继续钻进有困难。就此停下试油还是继续往下钻，必须果断做出决策。

苏联专家坚持认为基准井应该取心到底，然后由下至上逐层试油。如果我会说话，我真想大吼一声：“就此停钻试油吧！”因为我再清楚不过，钻到3200米不仅时间要推迟一年，而且很有可能由于井长期浸泡，把油挤到边上，将来就试不出油来。

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广泛听取意见后，经请示部长余秋里同意，决定于7月20日停钻试油。此后，又开展了一系列异常艰辛的工作。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目标——离出油的那一刻越来越近了！

历史的钟摆定格在1959年9月26日。这天上午，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出现涌动声。下午4时，一股棕褐色的油流从我体内喷涌而出。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人群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我能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如果我会说话、我会动，我又何尝不想加入这欢呼的队伍？

喜讯传出，正值国庆10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把我所在的大同镇改名为“大庆”，新发现的油田也因此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的发现，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自1960年试采以来，我日夜不息地喷涌原油，累计产油量10088吨。1988年7月，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关井停产。1989年9月26日，在钻探出油的30年后，我的头顶竖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刻着康世恩题写的大字：“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2001年，我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时不时有人来看我。人们读着石碑上记录的故事，看着井口留存的那株采油树，仿佛穿越到几十年前，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身后，“大庆从这里走来”浮雕墙如红旗般展开，那些艰苦奋斗的身影永久地镌刻于此，镌刻于光辉的历史中。

萨55井：与“铁人”结缘的5天4小时

我叫萨55井，生于1960年。我住在大庆市红岗区解放南村以西的杨树林。也许你不曾听过我的名字，但你一定知道“铁人”王进喜。而我便是王进喜在大庆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后，中央指示加快进行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工作。在中央号召下，各地、各系统几万人奔赴大庆这片热土。甘肃玉门油田的王进喜，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1960年3月15日，他带着1205钻井队（当时称1262钻井队）37人踏上火车，往大庆进发。

3月25日，王进喜和钻井队队员抵达萨尔图火车站。下车后，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马上就能钻出油井来。

4月2日，钻井队的钻机运到了我所在的地方，但吊车却没有到位。面对60多吨的“巨无霸”，37个西北汉子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办？王进喜说，石油大会战就像打仗一样，只能上、不能等，我们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全都拉上井场。于是，大家开动脑筋，刨出一个带斜坡的土坑，汽车倒进去后，车箱底板便和地面形成一个坡度，然后再垫上滚杠……就这样用棕绳拉、撬杠撬，经过3天3夜努力，终于让几十吨重的钻井设备就位。

钻井需要大量的水，但等水罐车送水要到3天后。为了不延误开钻时间，王进喜和队员们刨开冻土，挖出几眼水井，但水量仍不能满足需要。王进喜又带着大家去1公里外的冰泡子破冰取水、运冰化水，用脸盆、铝盔、水桶等接力盛水。附近的老乡们听闻这个讯息，纷纷加入进来帮忙，茫茫冰原上排成了一条壮观的运水长龙。他们硬是靠人力往井场里运了50多吨水，提早了开钻时间。

仅用了5天4小时，王进喜带领的钻井队就完成了对我的钻井任务。自1960年5月26日正式投产，到2017年8月光荣退休，几十年时间里，我累计产出原油15.202万吨，也算不辱“铁人一口井”的使命。

我和王进喜相处的时间很短，他带着钻井队很快又奔赴下一个战场。我听说他们在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喷，王进喜为了制服井喷，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1970年，王进喜不幸病逝，终年47岁。为了纪念王进喜，国家把我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我身边还原了王进喜当年挖的水井、住的地窨子，还有为了卸钻井装备挖的土坑。在市区的繁华地段，矗立着一座国家一级博物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通过照片、文字、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手段，讲述王进喜一生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故事。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所有的奉献都会被铭记

我有两个名字。年轻时我叫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我见证了人们步履匆匆、争分夺秒，在这里制定一个又一个油田开发建设的关键决策。退休后，我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人们对我进行了一番改造，把3栋平房布置成6个展厅，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

踏入我的家门，你的脚下是一条青铜铺就的大庆之路，它镌刻着大庆油田开发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这条路上的年份数字排列逐渐变小，它带着你走进历史深处，走进大庆油田建设的一个个真实场景……

20世纪60年代，大庆原油开始外运。因为地处高寒地区，原油凝固点又高，要想把原油运出去就得提前加温。这就要弄清楚长途运输过程中沿途风速、气温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油温变化。技术人员蔡升和张孔法承担了随油罐车测温的任务。油罐车没有任何保温措施，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探出身子测量一次风速和气温。当列车停下时，他们又得爬到车顶上测油温。就这样，他们从大庆到大连往返5次，行程达1万多公里，最终测得了风速、大气温度和油温等2800多个数据，掌握了油温变化的规律，为解决原油外运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大庆油田发展史上，像“万里测温”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工程师谭学陵带领四人小组爬冰卧雪，观察测定1600多个点，进行1100多次分析对比，终于测出了大庆地区的土壤传热系数，据此设计出合适的加热保温集输方案。采油一厂三矿四队队长辛玉和对于施工过程中任何一点小差错都不放过，要求全队员工对每盘长达1500米的清蜡钢丝用放大镜一寸寸地进行检查。“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就发源于此。

在我的展柜里，有一个使用了42年的高压截止阀，它来自“岗位责任制”发源地北二注水站。1961年建站时这个阀门就开始使用，直到2003年系统改造才被更换下来。正是由于工人们在岗尽责、精心维护，这个阀门使用了42年没出现任何问题。北二注水站迄今已安全生产2万多天。

有人曾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国外一些大油田是石头泡在油里面，大庆油田却是油嵌在石头里，开采难度相当大。尤其是越到后期，开采就越难。面对出油越来越“吝啬”的油田，以大庆“新铁人”王启民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开创了一项又一项新的采油技术，把石油从石头缝里一点点抠出来。第三代“铁人”李新民带领1205钻井队先后到苏丹和伊拉克等地打井，实现了老队长王进喜“要把井打到国外去”的愿望，在国际舞台上打响了大庆品牌。

在以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为代表的大庆石油人努力下，大庆油田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从1976年到2002年，实现5000万吨以上连续27年高产稳产，而世界同类油田稳产期一般只有3-5年，最多不过12年。从2003年到2014年，大庆油田又实现4000万吨连续12年持续稳产。2015年以来，继续保持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当量4000万吨以上的世界级水平。

60年弹指一挥间。几万个曾经在大庆挥洒汗水的劳动者的名字，都记录在我的档案里，他们的付出不会被历史遗忘。

走到我的尾厅，大庆之路再次出现。这条路比开始时更宽阔，年份数字从2006年到2060年逐渐变大，寓意大庆油田从辉煌历史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大庆正在向建设百年油田的目标不懈努力，我祝福他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让工业遗产成为文化新地标

□范　周

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爆发，人类文明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生产力革命中完成了由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轨。工业遗产见证了工业文化的孕育、成熟和变迁，是全球文明进程的重要史料。除了历史价值，工业遗产的艺术价值体现在建筑风格、景观美学等方面，科技价值体现在工业技艺、制造流程等方面，经济价值体现在开发和再利用方面，社会价值体现在集体情感、精神风貌、文化多样等方面。

保护工业遗产是文化自觉的表现，也是成熟社会管理形态的体现。法国早在1840年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历史性建筑法案》。20世纪50年代，英国明确了“工业考古”的概念。1986年，拥有世界上第一座金属桥的英国铁桥峡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美国苏荷区、德国鲁尔区，都是工业遗址保护更新的经典案例。

近年来，中国越发重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和实践。汉冶萍钢铁厂、青岛啤酒厂、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基地等多处遗址被确定为国家级工业遗产博物馆。各地广泛开展关于工业遗产的调查、申报、保护工作。2018年1月，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国城市学会联合发布《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一批）》。2019年4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第二批）》发布。随着两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发布，我们对于工业遗产的认识更加深入，相关的研究保护工作也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的摇篮。以工业建筑为核心，蔓生出市民的生产生活脉络，构筑起城市的有机体。在工业遗产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整体性和原真性两个原则。

这就要求把工业遗产安全放在首位。近年来，文物建筑遗存遭毁的“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令人痛心疾首。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务必摸清工业遗产现状，建立明确权属关系，制定科学的应急防范预案。只有保障安全，才能在此基础上把握工业遗产价值，进而分级、分类开发。

还要考虑到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肌理的关系。中国城市工业化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围绕工业区建成的单位大院。二者形成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中国传统院落的空间秩序，同时也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保护工业遗产要综合时空关系和社会语境，处理好工业遗存与城市规划、历史街区等方面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建立综合、整体的保护机制，避免“碎片化”保护。

要树立物质遗存与精神文化保护并重的观念。工业遗产蕴含着城市精神，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总和。大庆松基三井见证了大庆油田的诞生，也是新中国石油工业成就和大庆精神的重要象征。大庆市要传承城市文化根脉，就要充分提炼和发扬工业遗产的精神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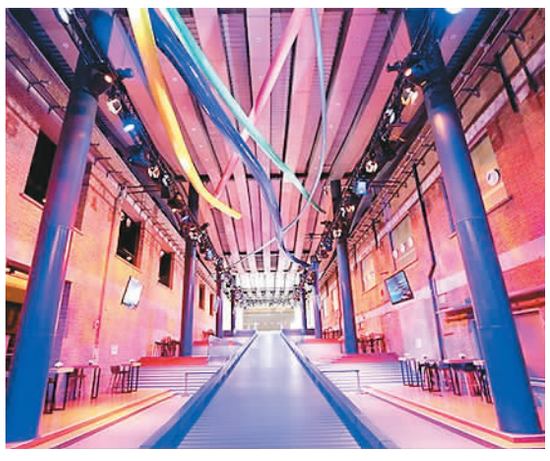
保护与开发不是相悖的，在保护工业遗产的基础上使其成为文化创新的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历久弥新、永续发展。

一种思路是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社区营造、公共服务结合起来。重视工业遗存与城市景观塑造的统一，加强工业遗存与周边新老社区的对话。前身是燃气用具厂房的北京市朝阳规划艺术馆，如今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缩影，积极探索数字化智慧展馆模式，打造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会客厅。

一种思路是“腾笼换鸟”，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盘活工业存量空间，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是城市发展动能转化和业态升级的重要途径。许多老旧厂房探索“文化+科技”转型升级新方向，由粗糙化改造逐渐走向精细化运营，越来越多“工业废墟”变身“创意高地”。

工业遗产这座富矿，不仅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新时代的工业遗产不仅要成为展示工业文明的窗口，更应接续城市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建、共享的文化新地标。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



北京市朝阳规划艺术馆，由北京市燕山燃气用具厂的三座老厂房改造而成　**网络图片**